

舟山诗话

从閻公诗作一窥黄斌卿治下舟山

□刘辉

几社领袖、南明志士徐孚远(1599~1665)，字闇公，晚号复斋，江南华亭人，乃明朝内阁首辅徐阶之弟徐陟的曾孙，家居华亭南门内河曲。崇祯壬午年(1642)，徐孚远举于乡，明亡之前，主要活跃于松江一带，潜心科举应试与学术研讨，与陈子龙、夏允彝、彭宾等共创几社，编纂有《壬申文选》《史记测议》《几社文选》《皇明经世文编》等典籍，声名卓著。崇祯甲申之变后，清兵挥师南下，乙酉年(1645)，徐孚远携家人投身松江保卫战，城破之日，长子徐世威壮烈殉国，他强忍丧子之痛，与妻子航海入闽，投奔唐王朱聿键，受命为大兴司礼。此后数年间，他辗转抗清，顺治四年(1647)以兵科给事中随张肯堂水师北上奔赴舟山，顺治六年(1649)获鲁王擢升为国子监祭酒、左金都御史，顺治八年(1651)清军破舟山后，护送鲁王至厦门，顺治十年(1653)以监军身份参与张名振、张煌言北伐之役，顺治十四年(1657)受鲁王与郑成功委派取道安南觐见永历帝，顺治十七年(1660)辅佐郑经留守厦门，康熙元年(1662)随郑经入台，居于彰化，一边躬耕陇亩养家糊口，一边与台岛遗民唱和往来，有组建“海外几社”之说。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年(1661~1663)间，他为避清廷追捕，往来于闽粤铜山、饶平之间，终在康熙四年(1665)赍志而歿。徐孚远的诗歌大多收

录于《钓璜堂存稿》二十卷，其诗多以悲壮之语抒发家国情怀，诗风豪迈苍凉，不少篇章兼具诗史价值，为后世留存了南明乱世的珍贵印记。

隆武二年(1646)八月清军进攻福建前夕，时任福州推官的徐孚远已预感“闽事不支，浮海入浙，而浙亦亡”，恰逢郑彩迎鲁王至福建抗清，他便“周旋诸义旅间，欲令协和共事”。监国鲁二年(1647)正月，鲁王在长垣(今南竿岛)誓师，当月平夷伯周崔芝便攻克海口(今福清市海口镇)，黄宗羲《海外恸哭记》记载：“总制尚书张肯堂、兵科给事中徐孚远……皆依周鹤芝于海口。海口既陷，故北至舟山依黄斌卿。”海口于当年四月沦陷，徐孚远赴舟山的时间可从其诗作中推定：他为四月奉命赴日乞师的安昌王所作《传安昌自渝海北归遥赠》中有“相闻已命广陵驾，八月观涛思不禁”之句，可知是年八月他已萌生渡海赴舟山与安昌王重聚之念；而张煌言《九日陪安昌王、黄肃虜虎痴、张定西侯服、张太傅颯洲、朱太常闻玄、徐给谏闇公及沈公子昆季登锁山和韵》一诗，则印证他抵达舟山当在是年九月九日前。初至舟山，徐孚远以《初至舟山》一诗记录所见所感：“北来昌国晚，此地尚车书。耕凿惊魂后，衣冠入眼初。”寥寥二十字，道尽乱世中的意外慰藉。

弘光元年(1645)五月弘光政权崩溃，监国鲁元年(1646)六月浙东抗清局势危殆，大批南明士人纷纷汇聚舟山，徐孚远于监国鲁二年秋才抵达，故自称“晚”来者。彼时舟山的实际治理者，是隆武帝册封的“肃虜伯”黄斌卿。黄斌卿，字明辅，号虎痴，福建莆田人，崇祯末年便以浙江副总兵兼宁绍参将之职镇守舟山，弘光元年南京陷落后，他赴闽朝见隆武帝，获封“肃虜伯，镇舟山”，在旧部拥戴下迅速掌控舟山全域。他积极整顿地方，“修理城郭仓库，招集商贾，率百姓开垦荒废田地”，通过修缮基础设施、复苏农商经济，让舟山在乱世中得以维系秩序，成为南明抗清的重要据点。徐孚远初到之时，见此地“车书”一统、“衣冠”如故，与神州陆沉的惨状形成鲜明对比，不禁心生感慨，而其《昌国学》一诗，更细致描摹了黄斌卿治下舟山的文教兴盛景象。

胡来天地翻，奎壁失其宿。
子衿左其社，宣圣不可救。
春秋虽荐禋，流涕临俎豆。
我行适昌国，耳目忽如昼。
此地本废邑，向无儒官守。
大将踞城居，文物俨朝旧。
乃请东官师，言采荒山秀。
刘楚十六七，璨璨矜衫袖。
便乃飭泮池，闕宫眼前覩。
从此敦诗书，学者渐以凑。

诗的开篇先写清军南下后的浩劫，天地倾覆，文运沦丧，

儒学子弟被迫改易衣冠，圣道不行，即便春秋祭祀依旧，也只能对着礼器流涕伤怀。就在这满目疮痍之中，舟山却如暗夜中的曙光，让徐孚远“耳目忽如昼”。“此地本废邑，向无儒官守”，追溯明洪武二十年海禁之后，昌国县被废，仅余两处卫所，长期无儒学教化之实；“大将踞城居，文物俨朝旧”，则直指黄斌卿的治理之功，这位兼具儒将之风的守将，让舟山保留了明朝的典章文物与衣冠礼乐。彼时的舟山，汇聚了太子少保张肯堂、吏部侍郎朱永佑、举人张煌言、复社成员冯京第、贡生朱舜水等一众名士，黄斌卿延请素有贤名的太子少保张肯堂主持文教，张肯堂悉心选拔当地英才，“刘楚十六七，璨璨矜衫袖”，将璞玉般的后学雕琢成才。黄斌卿更下令修建学宫、开凿泮池，使这座“向无儒官守”的海岛，诞生了堪比县学、府学的教育机构，“便乃飭泮池，闕宫眼前覩”，徐孚远引用《诗经·鲁颂·闕宫》的典故，既盛赞学宫的落成，更颂扬黄斌卿在乱世中兴文重教的功绩。如今定海一中的泮池，据诗中记述，便是当年黄斌卿下令疏浚的遗存，静静流淌着那段文脉不绝的岁月记忆。

徐孚远的诗作，以诗证史，让我们得以窥见黄斌卿治下舟山的秩序与生机，更见证了南明士人在乱世中坚守文脉、维系衣冠的不屈精神。

朝花夕拾

舟山民间传统茶俗

□阿能

喝茶是舟山人的传统习俗。舟山自古产茶，茶史悠久。“至五代时，山僧开始在寺院周围植茶，至宋代称盛。”宋代已形成了完整的茶叶生产产业链。明清时期，茶叶生产得到快速发展。明朝李桐诗云：“山山争说采香芽，拨雾穿云去路赊。制就漫将炉火试，氤氲佳气遍僧家。”生动形象地描述了采茶的繁忙和茶香的诱人。清末民初，茶税收入已成为除水产品税收外的第二大财政来源，可见已是经济支柱产业之一。

舟山茶叶毓山海之灵秀，沐佛国之光华，品质上乘，久负盛名。普陀佛茶、黄杨尖芽茶和蓬莱仙芝都以外形细嫩，叶尖白茸，色泽翠绿和浸泡时汤色清澈，香气幽雅的茶中珍品而享誉海内外。明王阳明在赋诗《茶山夙雾》时写道：“好山远峙海海南，瑞草瑶花自不凡。铁色青笼煨榾鼎，宝珠红蚶老禅龕。”形容普陀山佛茶如瑞草瑶花，仙叶灵芽。清乾隆至光绪年间，普陀山佛茶成为贡品。

元大德《昌国州图志》卷三《茶课》所载四明缴纳的三锭零五两六钱四分银，实即“为无茶园及磨茶户”所“认办”的。大德《昌国州图志》载：“茶课，周岁起催，三锭丹五两六钱四分银。旧实无之，

始于元至元三十年(1293)，茶提举到州，取勘为无茶园及磨茶户，故令各都认办此数。”

明天启《舟山志》载：“货属，茶。”当时，浙江成茶除供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消费外，还有一部分从宁波港口输出国外。明代时山僧喝茶有了专门的茶室，以为饮茶吟诗作对。

明代，普陀禅僧嗜饮佛茶，高雅者爱茶及壶，茶具收藏也随之丰富。清康熙《定海县志·物产·木之属》载：“茶，按《茶经》：一曰茶，二曰檉，三曰藪，四曰茗，五曰笋。定无佳品，惟谷雨前者曰雨茶，谷雨后曰夏茶，皆山谷野茶。又不善制，故香味不及园茶之美。至五月时，重抽者曰二乌，益苦涩，不堪产。”“茶，产桃花山者佳。普陀山者，可愈肺痈、血痢。然亦不甚多得。”雍正十二年(1734)，陆廷燾《续茶经·茶之出》引《普陀山志》言：“茶以白华岩顶者为佳。”清康熙《定海县志·物产》载：“康熙四十年(1701)，英人詹姆斯·哈姆在定海采到茶树标本带回欧洲。”定海金塘岛在古近代就盛产茶叶，还有用茶水来待客的习俗。

民国《定海县志》载：“茶分东乡西乡，东乡较胜，然采制均不得法，惟洞吞黄杨尖、岱山石马吞乃雨前所采，制法又稍精，

人争购之，惜产额不多。”当时岱山“全县各地均有栽培，以岱中、小高亭为多”(《岱山药物志·茶》)。

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，定海黄杨尖芽茶被评为三等奖。1926年至1927年间，宁波、上海的茶商委托定海本地捐客，收购定海芽茶达15吨，并远销欧美。民国16年(1927)《岱山镇志》“地产之属”载：“茶叶以石马吞、刘家岙所出者为最佳，色香味皆胜，惟所出不多。”民国21年(1932)产茶叶75吨。1935年，美国《茶与咖啡贸易》杂志主编、学者威廉·乌克斯在他的《茶叶全书》中写到：“定海城东十余华里，有黄杨尖山，主峰为群岛之冠，并产茶叶，采制亦合法，为定海之胜。”民国26至27年，上海、宁波等地茶商委托舟山当地捐客，每年到定海收购“黄杨尖芽茶”15吨，远销欧美等地。黄杨尖山西北麓北蝉后王山、白马湾等山上都曾有茶园。

悠久的茶史，凸显了舟山茶的文化底蕴，茶的流行，成为人们开门七件事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之一。特别明清后，茶文化开始从皇室贵族儒雅学士转向了民间。舟山民间更是饮茶成风，茶为吉祥之物，嫁娶习俗，不可无茶。茶乃圣洁之物，祭祀

习俗，不可无茶。茶是清雅之物，待客习俗，不可无茶。宋代出现茶寮和茶篋，也就是放茶和茶具的箱子。在古代，冬天装茶的茶篋总是被火温热，以备客来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舟山民间还有蒲草茶篋。

舟山人喝茶是有传统习惯的。清康熙《定海县志》载：“乡吞间居近通衢者，必家制茶篋，烹茶以待行人。从无识面，索茶立应。若知其路远、饥饿，即便留饭。”

康熙《定海县志·民风》载：“遇春夏茗叶抽苗，男妇相与入山采茶而已……俗好礼让。乡吞间居近通衢者，必家制茶篋，烹茶以待行人。从无识面，索茶立应。”

冬天为保温，则用蒲草茶篋温盐茶，茶之清香润口，冰天雪地，一碗热茶，在茶烟里，既解渴解乏，又暖身暖心。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291期

来稿请发
zswb03@zsnews.com